

老龄化的成本



正在打牌的人，意大利那不勒斯。

罗纳德·李、安德鲁·梅森

老龄化的人口和较缓慢的劳动人口增长以多种方式影响着经济，比如 GDP 的增长减速，劳动适龄人口用于支助老年人的支出上升，政府预算由于老年人医疗健康和退休成本的增加而倍感压力。

但是，老龄化的人口也可能会提高劳动者的人均资本量，从而提高工资和每工作小时的产出（生产力），而且由于高工资降低了资本回报率从而导致利率水平降低。不过，如果政府不鼓励公司大量运用可借贷资金进行投资，人口老龄化和较低的劳动人口增长可能也会导致长期停滞。

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婴儿潮繁荣时代的结束导致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下降，尽管有移民加入。很多实证研究表明，几乎每次 GDP 增长的减速都与劳动力和人口增长的下降同时出现，而后者正是美国和欧洲令人担忧的前景。

在 1975—2015 年的 40 年间，美国 20—64 岁人口平均每年增长 1.24%，但未来 40 年的预测仅为每年增长 0.29%。这可能会导致 GDP 增长率和总消费增长率相应下降。而且，很多发达经济体的劳动适

龄人口已经出现下降，其中欧洲国家的劳动适龄人口还将会在 2015—2055 年间下降 20% 以上，其 GDP 的增长也会随之下降。

人均产出很重要

但是，个人的福祉并不取决于合计值，而是要看人均值的增长情况。标准增长模型预测的结果显示，较慢的人口增长也可以带来劳动者人均产出和工资的增长。那么，这里隐含的问题就是劳动者的较高人均产出是否会转化为较高的人均收入。而这取决于，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增长的生产力中会有多少用于抵消劳动者人均依赖者（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数量增加的负担。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要依靠国民转移账户，更仔细地考察经济活动随年龄的变化情况。国民转移账户是用来衡量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生产、消费和节省资源情况（NTAccounts.org；Lee 和 Mason, 2011；United Nations,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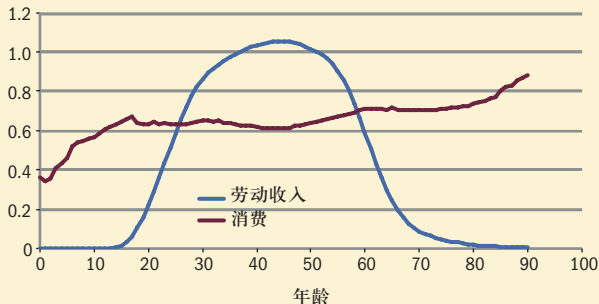
具体来说，儿童消费超过了生产，老年人的平均情况也是如此。儿童和某些老年人的消费则主要由青壮年（约 25—59 岁）

随着人口老龄化，富裕国家的 GDP 增长放缓，老年人支助成本上升，政府预算倍感压力

图1
收入与消费

25—59岁青壮年的收入多于消费，而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则相反。

(平均的人均值，指数，1=30—49岁人口的平均劳动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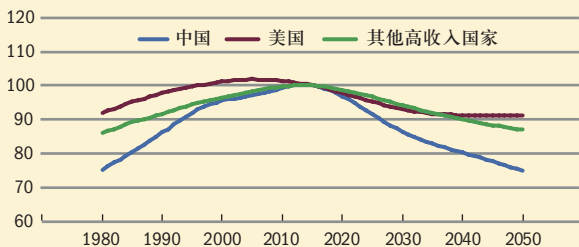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Mason、Lee等人, 即将发表。

注: 该数据涵盖了按世界银行分类为高收入的24个国家。劳动收入包括工资、福利、自雇者的劳动收入和无酬家庭工作者提供劳动的估计价值。消费包括归于个人的家庭支出, 以及各个年龄段的人所收到的实物公共转移。

图2
负担分摊

从现在到2050年, 支持消费者(少年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人)的劳动者数量将下降。

(支持比, 2015年=100)



资料来源: Mason、Lee等人, 即将发表。

注: 其他高收入国家是指世界银行分类为高收入的24个国家(不包括美国)。支持比是劳动者数量除以消费者总数量(即所有人口)。

提供, 因为青壮年的生产比消费大(见图1)。随着人口老龄化, 劳动者的比例下降, 而消费相对较高的老年人比例则同时上升。其中, 在日本、瑞典和美国等国家, 老年人的相对消费要比图1中所描绘的平均水平高得多, 而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家, 老年人消费的相对增长则要小很多。虽然占人口比例较少的儿童可以部分地抵消老年人的更多消费, 但是, 如果生育率开始从当前的低水平恢复, 则儿童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例可能会上升, 从而加大了青壮年劳动者的压力。

而且, 老龄化的人口给整个社会施加了预算压力, 因为相对于消费者数量而言, 劳动者数量出现了下降。这一现象可通过赡养比率进行量化, 赡养比率是指劳动者总数与消费者总数(包括所有人——少年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人)的比率。

赡养比越低, 向消费者提供资金的劳动者数量就越少, 因此, 就必须减少消费或者增加劳动力供给——例如, 通过推迟退休。在2015年到2050年期间, 美国的赡养比每年会下降0.26%, 其他高收入国家每年会下降0.40%, 中国每年会下降0.82%(见图2)。这意味着, 到2050年, 除非劳动力供给增长, 否则中国的消费必然下降25%, 美国的消费必然下降9%, 其他高收入国家的消费必然下降13%。当然, 图1中所展示的消费和收入年龄模型必须根据新的人口统计现实进行调整。

老年人消费的资金来源

老年人通过多种收入来源来支付自己的消费, 除了可以通过继续工作取得收入之外, 老年消费者还部分地依靠他们的资产(包括农场、企业、房产、储蓄和投资), 另一部分则来自于政府提供的养老金等现金收入, 以及医疗健康 and 长期护理等实物公共转移。而这些公共转移是由税收支付的, 大部分税收则都是由青壮年缴纳的。此外, 还有一部分老年人的消费可能来自于年轻家庭成员的净支助(接受的支助减去提供的支助)。其中, 在东亚, 老年人从家庭得到的支助比其提供的支助要多, 但是在其他亚洲地区(包括日本和韩国)以及欧洲和美洲, 平均来说, 老年人提供给年轻家庭成员的支助要多于其获得的支助。

老龄化的人口给整个社会施加了预算压力。

一般来说, 老年人支付自己消费的比例越高, 青壮年以较高税收方式负担的老年人支助成本就越少(见图3)。欧洲就是因为严重依赖公共部门转移支助老年人消费而特别引人关注。相反, 如果老年人支付(无论是通过资产收入, 还是通过继续工作)自己消费的比例很低, 那么, 随着人口老龄化, 他们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美国的情况则正好与此相反, 因为美国人普遍较晚退休且晚年更多依靠自己的资产。拉丁美洲介于美国和欧洲之间, 亚洲则与美国类似。

随着人口老龄化, 养老金、医疗保健、长期护理等公共部门转移将特别成问题, 因为即使在扣除由老年人所缴纳税收提供的资金之后, 这些支出还是占了公共预算的大部分份额。而且, 预测显示, 除非通过增加税收或者削减福利, 要么两者并举, 否则这些项目通常都将无法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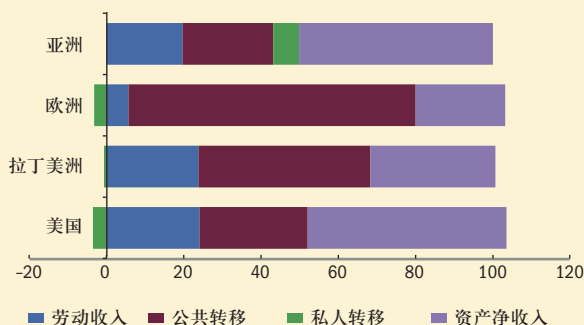
财政赡养比率就是反映此问题的一项指标, 其构成与赡养比率类似, 只是将赡养比率的劳动者数量对消费者数量的比率换成了纳税者数量对受益者数量的比率。具体来说, 在2010年到2050年期间, 由于人口老龄化, 美国的财政赡养比率将下降11%。这意味着, 要平衡2050年

图3

老年人的钱包

各地区支持老年人消费的资金来源千差万别。

(消费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民转移账户；www.ntaccounts.org。

注：亚洲=澳大利亚、柬埔寨、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老挝、菲律宾、中国台湾、泰国。欧洲=奥地利、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拉丁美洲=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牙买加、墨西哥、乌拉圭。劳动收入包括工资、福利、自雇者的劳动收入和无酬家庭工作者提供劳动的估计价值。公共转移和私人转移为净值（收到的转移减去提供的转移）。资产净收入是指资产收益减去利息费用和储蓄。

的税收收入和公共预算（联邦、州和地方合计）支出，仅仅是为了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成本增加，就必须将税收收入提高11%，或者将支出减少11%，或者是两者在某种程度上相结合。欧洲国家的相应数值位于14%与28%之间，日本的相应数值是26%。这些数值都是指整个政府的预算，而不是只包括社会福利部分。另外，某些政府试图重组其公共转移项目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提高退休年龄以及将福利水平与税收收入的可用性密切联系起来，但这是政治上的一项艰巨任务。

生产力的提高

如果整体储蓄率保持不变，同时劳动力增长减速，则人均资本量（比如机器、道路、参与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办公设备）将增加，从而提高生产力和工资，降低利率。例如，相较于1975—2015年，美国的生产力将在2015—2055年期间每年下降1%，这意味着劳动者人均资本量将大幅上升。而且，在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老年人是净储蓄者（Lee和Mason，2011），比年轻的成年人拥有更多的资产。此外，更长的寿命和更低的生育率也提高了储蓄率，增加了私人储蓄。

但在有些情况下，劳动者人均资本量可能并不会增加。首先，如果人口老龄化迫使政府借贷更多的资金用于支付福利支出，从而导致用于私营资本投资的资金可能会被挤出。其次，如果劳动者人均资本量开始上升，导致利率下降，那么成年人可能会选择储蓄更少的钱，而这最终会降低资本增量。第三种可能是，投资者将前往外国资本市场寻求

更高回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更年轻，投资回报率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劳动者将无法因工资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受益，尽管在国外投资的回报也会提高国民收入。

长期经济下滑

因此，公司可能会选择大幅削减在国内经济中的投资，甚至在利率降低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且，如果它们认为产出和消费增长将由于人口和劳动力的下降而放缓时，则可能还会降低全要素生产力（即经济增长中无法用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来解释的部分，反映了技术等隐含要素的作用）。所以，如果公司变得悲观，即使中央银行将利率降至零以下，经济仍然可能会保持停滞，同时出现长期高失业率——即所谓的长期停滞现象（见本期《金融与发展》，“疲弱的未来”和“经济增长走向何方？”）。例如，一些经济学家就运用长期停滞概念来解释日本近几十年几乎持平的经济增长，以及欧洲未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现象（Teulings和Baldwin，2014）。

总之，虽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GDP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将必然放缓，但是这些对个人的影响（用人均收入和消费来衡量）可能会差别相当大。虽然老龄化的人口将意味着更多的老年依赖，而且达到老年人无法依靠自己的资产和劳动来维持自己生活的程度，但是，老龄化也可能会增加劳动者的人均资本量，提高生产力和工资，特别是在政府债务没有挤出资本投资的情况下（Lee，2016）。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是好还是坏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而是取决于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以及公共政策如何根据新的人口统计情况进行调整。■

罗纳德·李（Ronald Lee）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教授，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是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经济学教授和东西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

Lee, Ronald. 2016. "Macroeconomics, Aging and Growth." In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Aging*, edited by John Piggott and Alan Woodland. Amsterdam: Elsevier, 59–118.

——, and Andrew Mason. 2011.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Generational Economy: A Global Perspective*. 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Edward Elgar.

Mason, Andrew, Ronald Lee, and others. Forthcoming. "Support Ratios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s: Estimates for the World."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Technical Report*, New York.

Teulings, Coen, and Richard Baldwin, eds. 2014. *Secular Stagnation: Facts, Causes and Cures*. VoxEU.org eBook,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United Nations. 2013. *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 Manual: Measuring and Analysing the Generational Economy*.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